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第四分册

人民出版社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马 克 思
法 兰 西 内 战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根据 1964 年 5 月第 2 版重排

1971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001·602 每部(四册共) 1.45 元

(3) 地主议会

如果说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议会产生的，那末那个议会则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预告未来的事态发展，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须克服一桩困难。且不说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们大批当选，也会立即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凯恩去旅行。奥尔良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满他们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腾出来的席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统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统派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争权夺利的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话来说，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1833年1月5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适的盲目工具。一小部分被1789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仆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赠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力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续的王朝统治下，他们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

为他们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们免除了在巴黎的宫廷花费和当代表的花费，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现代工业树上落到他们寨堡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了他们的地价，农业资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们的土地上来又提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产品的市场扩大。正是这些使他们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高他们作为现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素，也障蔽着他们受不到现代思想的沾染，使他们可能处在农村的闭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学会。他们这些人纯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给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成对他甘拜下风的奴仆。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经这样设好，巴黎的投降派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1月28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问题。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没有考虑商议的时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鲁士刺刀统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的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绝；尽管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法国人民却本能地感到：投降派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给法国任何的抉择（选择）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

波尔多出现的地主议会。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闹宴和地主议员们的真正历史事业，我们仍须加以区别。地主议员们突然发现，在由他们自己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数中，他们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到1816年的“无双议院”去——它的疯狂而愤怒地诅咒革命洪水及其吓人惨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以封建主寨堡的地方势力突破国家统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宗教说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绅士架子和轻浮粗鲁的作风、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视、以及它的从oeil de boeuf^①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统派只能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1848年到1851年，他们只不过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别，所不同的是当年代表他们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如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现在他们只得从农村地主这种庸碌之辈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给议会添上了另外一种情调，以封建色彩掩盖了它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种种荒唐的大话（说

① 直译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宫廷中一个装有椭圆形窗户的前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觐见。——编者注

教) 只不过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强盗政府的自由主义。他们被诱而僭取了超出选民委托的大权, 他们只好看着那些自封的统治者的脸色过日子。虽然 1814 年和 1815 年的外敌入侵¹⁶³ 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用来反对他们的致命武器, 他们却出于毫无见识的盲目愚昧, 自己承担起来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这次将法国拱手送给外敌的史无前例的投降的责任。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久已被埋葬, 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 感到惊讶和耻辱, 他们已经明白: 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 而且必须彻底完成 1789 年的革命, 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

(5) 内战的开始。3 月 18 日的 革命。克列芒·托马。勒 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解除巴黎的武装, 假如只是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必要条件, 本来可以从长计议, 审慎从事; 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装是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财政条约中的一款, 它就是刻不容缓的了。因此, 梯也尔必须来一个政变的尝试。于是他就发动了内战: 他派十二月分子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团常备军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国民自卫军与兵士们的和好, 他的这个罪恶企图没有得逞, 第二天, 他在一份贴到巴黎墙上

的宣言里告诉国民自卫军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他们的武器赏给他们，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他的号召。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4万人的护身军队，目的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3月18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烈的措施，也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

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象受到一次电击而悚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军击溃维努亚，只是给予统治阶级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的一次挫败，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们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才能显示出来。3月18日的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象受到一次电击而悚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阶级在脸上还带着因长期挨饿而出现的皱纹，而且又处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维护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洋溢着历史首创性的崇高热诚的巴黎工人的革命，认为保持无产阶级不犯他们的天然尊长(上等人)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罪行，是与它的荣誉攸关的事情。

克列芒·托马、勒康特等等

但是，玷污这次革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们的敌人硬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暴行中，只有两件事情不是凡尔赛的蓄意诬蔑或廉价文丐杜撰的谰言，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关于这两件事，我们要简单交代几句。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袭蒙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团的兵士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在3月18日下午在红宫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士兵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在里面起着傀儡(负责的经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民报》一派人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诈取得了政权，他们

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将军头衔突然中止。他隐没起来，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们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当然，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却唆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误信他们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生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马“将军”便被推上他的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千方百计地唆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解国民自卫军，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对无产者营妄加以怯阵的罪名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暴徒的 la fine fleur (精华)”的计划。好象被六月的冤魂所缠住似的，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

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

中央委员会竭力想从士兵们的粗鲁的私审判决下救出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这两个罪犯，但没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应负的责任，就象亚历山得拉公主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应负的责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假悲地咒骂巴黎这个凶手的渊藪。地主议会扮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们的鳄鱼之泪的。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内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诡计。在1848年，他们曾经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荡全欧的恐怖叫嚣！其实他们从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现任巴黎大主教^①——一个毫无殉道者气质的人——写给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疑虑，即他的凡尔赛的朋友们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们急切希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

^① 达尔布瓦。——编者注

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式各样的纨绔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进犯者并不见效。于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这些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打死，八名受重伤；在暴徒们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些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和平”游行的“徒手”性质。当1849年6月13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徒手”示威游行时，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用刀斩、马队践踏和枪击

① 贝热瑞。——编者注

对付游行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戒严，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3月22日的窜逃分子既没有受追袭，他们在逃窜中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没有受到法院侦查员(juge d'instruction)的传讯，所以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败以后，他们象巴黎其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许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较量。他们在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输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没受任何损伤地完成了他们的大出走，身后拖着荡妇、瘪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险分子。所谓3月22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谈论，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如果要挑剔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从3月18日到这些“秩序人物”大出走时期内在对待这些人的行动上的过错，那就是他们过分温和，温和得近似软弱了。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面吧！

秩序党在他们夜袭蒙马特尔失败以后，于4月初开始了他们向巴黎的正规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开了内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军士兵，因为卑鄙地谋害了我们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的装扮而闻名的女人的心上人，在一

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袭和收买叛徒的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象屠夫一样地把光明磊落、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的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骑在马上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巴黎的

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袭，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在睡梦中受到突袭）；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们被就地枪决，——所有这些在梯也尔公报里用轻率口气报道的功绩，只不过是这次奴隶主叛乱中的几桩事件而已！但是面对着为最卑鄙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的凡尔赛阴谋分子在法国废墟上制造的目前这次国内战争，面对着在俾斯麦的庇护下和在俾斯麦士兵的监视下对巴黎进行的轰击，只列举几桩个别的残酷事实，未免荒唐可笑！梯也尔在公报中报告这些事情的轻率态度，甚至使不大敏感的《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然而，正象西班牙人常说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在统治阶级与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的生产阶级进行的战斗中，总是充满着这类暴行，但没有一次象在这次战斗中那样，被压迫者显示了这样过分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卑鄙无耻……梯也尔永远遵循着中世纪浪游骑士的老格言：一切武器只要是用来反对平民的都是正当的武器。

梯也尔给各省省长写道：“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

贝耳-埃潘事件

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发生这样的事件：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一队骑兵包围，并被勒令缴械投降。由于无法抵抗，他们服从了，并没有受到骑兵的伤害。稍后，骑兵队长（加利费手下的一位宝贝军官）疾驰而

来，用手枪一个个地枪毙了俘虏，然后和他的骑兵队离开了。三名自卫军士兵牺牲，一位名叫舍弗尔的身受重伤，但活下来了，后来被送到比塞特尔的医院。公社派了一个调查团到医院记下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证词，并发表在它的报告上。当国民议会中的一位巴黎议员就这份报告向陆军部长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象奥利维耶那样轻松^①），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梯也尔举办的珍馐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6）公 社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¹⁶⁴。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

^① 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见本书第119页）。——编者注

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鸣般的“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宣言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象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象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